

## Chapter 3

# 国家激活

国家激活(National activation)这一概念与国家崛起(或大国崛起)有一定的区别,国家激活更强调国家处于一种积极向前且前景光明的状态(通常表现为较强的社会凝聚力、以及众多机遇的出现),这就好比是人处于兴奋状态一般,也可以类比为物理中物体具有较大的动量(momentum)。这种国家激活的状态既可能出现在大国也可能出现于小国。这一概念最早是在2002年出版的《历史中的模式与行为策略集(Pattern and Repertoire in History)》一书中基于对21世纪东亚及南亚国家的观察与思考而提出的:

东亚及南亚国家具备了国家激活这一过程所需的若干条件:国家资源的强劲增长、人口的高速增长、民主化带来的各阶层民众对公共事务更广泛的参与讨论。但目前这种国家激活的类型与19到20世纪欧洲国家的国家激活并不相同。

东亚及南亚的几个国家(尤其是中国和印度)在最近15年(2002-2017)内已然很接近于国家激活的状态。下面我们将解释为何目前中国被认为已经进入了国家激活的阶段,而这一状态对中国的外交和国防政策都会有重要影响。

但在进入具体细节之间,我们首先想请读者先将注意力放到一个重要的问题上——那就是内生因素(endogenous factor)与外生因素(exogenous factor)的区别。

### 3.1 国家发展过程中的内生因素与外生因素

“天下大势,分久必和,和久必分”。中华的悠悠历史既有一连串领土扩张的凯歌高奏,又有盛世过后的版图缩小、分崩离析和百姓的颠沛流离。然而如果认为盛世之后的丢城失地和混乱局面只是由内部因素造成,也会有失偏颇、将问题简单化;清朝便是个很好的例证,它的衰落就不只是受内部因素影响。

#### 3.1.1 清朝前期的版图扩张

清朝从1644至1912共持续了269年,在最初的70年里,清朝是一个成功的扩张王朝;但到了这个王朝最后的70年却毫无成功可言。但清王朝在最后70年里的内部组织结构及其效率与最初70年相比或许既没有更好也没有更糟,然而从军事成就和领土扩张角度来看,这两个70年简直是天差地别。

准噶尔之战(1687-1757, 清代文献称“平定准噶尔/准部”)是准噶尔汗国与清朝及其藩属蒙古之间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 清朝取得最终胜利后一举将外蒙古、西藏以及新疆纳入了大清版图。

### 3.1.2 清朝后期的版图缩小



图 3.1: 中国: 西方列强的蛋糕。在这幅政治漫画中, 英、德、俄、法、日正在瓜分中国: 德国的威廉二世和维多利亚女王争论不休; 象征法国的女孩(Marianne, 也就是所谓的玛丽安)并未参与瓜分, 但她的出现具有外交意义(她被画师安排在俄皇尼古拉斯二世身边, 提醒我们法俄同盟与德国的对立局势)。

来源: 最初刊登在1898年1月16日的法国杂志《Le Petit Journal》上, 转载自法国国家图书馆

还是那个百年前平定准葛尔的清朝却在第一次鸦片战争(1839-1842)中完败于英国, 被迫签署《南京条约》: 清朝依该条约须将香港岛永久割让给英国, 并接受在上海、广州、宁波、福州、厦门建立通商口岸。法国在1843和1844年的条约中也享有了与英国相同的特权。

### 3.1.3 国外势力的急剧变化

对于清朝而言, 其自1757至1842年间的主要变化并不是内生性的, 而是外部的敌人比过去更强了太多。当年准噶尔人用骆驼扛着微型火炮打仗, 这种做法虽然相当聪明但其效率却远远低于西方军队和海军使用的重型火炮和长射程步枪。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 清朝又遭受了西方国家的多次入侵, 而每一次入侵都让清朝更加衰微。

总而言之，虽然领土的变化似乎是衡量王朝兴盛与否的一个方便标准，但其也不应被视为唯一标准；对于这一点南宋王朝(1127–1279)就是一个例证<sup>1</sup>。

## 3.2 国家激活

追溯不同国家的近现代发展史，我们会发现大多数国家都曾出现过社会阶层流动与人口迁徙(social mobilization)和国家激活的阶段。更确切地说，当一个社会结束贵族专制统治，转而进入一种允许多数民众参与管理公共事务的状态，这一过程将促进社会交流、形成国家激活的状态。历史已经证明，更为频繁且深入的阶层互动通常会带来更高的社会效率、更强的自信心和更多的创新创造；而这些变化带来的新产生的力量总要寻找用武之地，领土扩张便是其出口之一。

历史上这样的现象不一而足，表3.1提供了几个典型案例：17世纪的瑞典和英国、1789年大革命之后的法国、1870年完成国家统一后的德国、后明治时期的日本、1947年重新建国后的以色列以及1917年革命之后的俄国。稍后我们将对这些实例进行更加详细的描述。

国家	时期	信仰	新军队	领土扩张	主要领导人
瑞典	1580 – 1700	新教主义	征兵	波罗的海	古斯塔夫·瓦萨
英国	1640 – 1680	清教主义	职业军人	爱尔兰	奥利弗·克伦威尔
法国	1789 – 1815	公民权利	征兵	欧洲	拿破仑·波拿巴
德国	1860 – 1918	爱国主义	统一军队	欧洲	奥托·冯·俾斯麦
中国	1925 – 1950	土地改革	人民军队	无	毛泽东

注：表中第二列的时间区间只是示意性的，类似的社会阶层流动以及人口迁徙(social mobilizations)很显然不会突然在某年就中断或完全结束。尽管法国在1815年的军事行动(著名的滑铁卢战役)以失败告终，但革命精神仍在法国长存，1830年7月和1848年2月的两次大革命的爆发就是例证(而且后者几乎蔓延到了整个欧洲)。尽管瑞典军队在17世纪初就已经开始实行征兵制，但其实这一制度直到1789年依然是新鲜事物。“统一军队”指的是德国军队不再是由过去分散的来自巴登、布兰登堡、萨克森的兵团以及神圣罗马帝国的其他部队所组成；如果用现在的情况做个类比，就相当于从北约(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NATO)这种由美国领导、不同国家部队组成的联合部队转变为一支真正统一的欧洲军队。

表 3.1: 不同国家的国家激活对应的时期

通过上述的例子，我们可以发现是否存在领土扩张的可能性其实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国际形势。例如1600-1709年瑞典得以成功对外扩张就是因为其邻国都很弱小(例如爱沙尼亚、利沃尼亚、拉脱维亚或波美拉尼亚)。当然即便没有出现领土扩张，通过以下几个特征也可以判断一个国家是否进入了国家激活状态：

### 1 广泛的信仰认同和增长的群众基础

<sup>1</sup>尽管南宋在宋金之战(1115-1234)败北之后失去了对中国北方的控制，但南宋王朝依然是最辉煌、最富有创新精神的王朝之一。南宋拥有伟大的发明(诸如火药和指南针)、繁荣的经济、发达的金融业以及广泛的海外贸易和航海探索。在索马里和坦桑尼亚进行的考古发掘中发现的大多数中国钱币都来自宋朝，这也从侧面印证了当年南宋在海上的成功。

- 2 人口增长
- 3 教育普及
- 4 不同社会阶层的民众可以广泛地交互(interaction)
- 5 经济飞速发展
- 6 (在许多西方案例中)国家军事力量从过去依靠雇佣兵转变为招募本国居民

下面我们将详细研究这几个方面。

### 3.2.1 广泛的信仰认同和增长的群众基础

任何社会运动要想获得长足发展的动力，都必须拥有一定的信仰<sup>2</sup>基础——参与者须深深相信并努力将此信仰传播到邻近地区的人群。这种信仰可能会是某种宗教信仰或教义，也可能是某种政治信仰[例如1789年诞生于法国的公民权利、1917年俄罗斯的共产主义或1925-1949年间中国革命所推崇的人民(尤其是农民)权利<sup>3</sup>]。

### 3.2.2 人口增长

人口统计数据显示中国1840年的人口是4.12亿 (Ho 1959)；如果该数字正确，那么从1840-1953(当年进行了第一次人口普查)的113年里，中国的人口增长率是 $(694-412)/(412 \times 113) = 0.60\%$ ；在1953-2015的63年里，人口增长率变成了 $(1382-694)/(694 \times 63) = 1.57\%$ 。虽然独生子女政策产生了极大影响，但中国的人口增长率仍比过去提高了2.6倍(见图3.2)。

法国在1789年大革命之后也有过类似的情形。从1740年到1792年法国人口从2460万增长到2800万<sup>4</sup>，年平均增长率为 $(28-24.6)/(24.6 \times 53) = 0.26\%$ ；从1792年到1846年，人口从2800万增长至3610万，增长率为0.54%。人们可能会认为这是由于卫生保健水平的提高，但这一解释并不成立，因为在接下来的50年里，法国人口只从3610万增长至3990万，年增长率仅为0.19%。因此在法国大革命后的50年里，除去战争因素的影响，人口增长率达到了1789年之前和1846年之后年增长率的两倍左右。

<sup>2</sup>西方也会称此为福音(gospel)，在具体的情况中可以解理为信仰、信念，在许多社会运动中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关于社会关系的新哲学观，而且在某些特定时期它也确实是以宗教教义的形式出现(例如基督教教义或诸如新教教义、清教教义等基督教的特殊信条)。

20世纪后半叶，新自由主义福音(neoliberal gospel)从美国传播到了所有西方国家，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还传到了中国。不过与法国、俄国或中国革命的信仰不同，新自由主义福音并未在普通民众中间广泛传播开来，反而是在经济学家、商人、立法者和媒体集团中更受推崇。

福音传播现象对于世界历史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理解影响这种现象的关键控制因素同样意义重大；目前在复杂网络研究领域已经有不少对于传播动力学(spreading dynamics)的研究(Pastor-Satorras 2015, Li 2016, Li 2013)，但这些研究现在都仍然太过理论，多数仍是理论上的数学模型，距离真正解释更为复杂的社会现象尚有很长的路要走。

<sup>3</sup>人类历史上曾发生过数百次农民起义，但据我们目前所知，除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起义，其他所有的农民起义都失败了。而且有趣的是，当年国民党既不称起义军为“共产党”也不称“农民”而是称作“共匪/赤匪”。

英文维基百科文章《List of peasant revolts(农民起义列表)》罗列了部分农民起义，并将其中一些起义标记为“成功的起义”。然而仔细阅读相应的描述后就会发现，这些起义本身并未成功，它们只是在内战中支持了合适的竞争者。例如1789年烧毁城堡的法国农民在某种意义上是成功的，但这只是因为巴黎起义推翻了贵族统治。而且维基百科的这份列表并没有提到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起义。

<sup>4</sup>参见维基百科文章《法国人口(Demographics of Franc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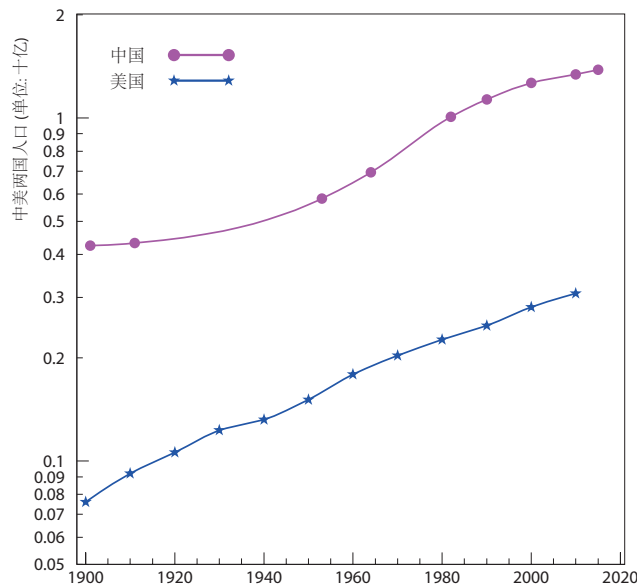


图 3.2: 中国和美国人口的增长。中国人口的增长是内生性的，而移民对于美国人口增长起了重要作用。1945年以前美国移民主要来自欧洲；1960年以后则主要来自墨西哥。

资料来源：英文维基百科文章《Demographics of China(中国人口)》和《Demographic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美国人口历史)》

### 3.2.3 教育的普及

教育的普及使得具有读写能力的人口占比迅速增长，中国的15岁以上公民的文盲率自1949年之后迅速下降(见图3.3)。

中国的扫盲运动(在1949年革命胜利之后，以及胜利之前的解放区)不仅针对学龄儿童，还包括成年人。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老师要求孩子们每天教给他们的父母一个新的汉字；换言之，孩子们自己就成了他们家中或者村子里的老师；这种方法见效相当迅速(参见图3.3)。这实则是一种基于人际强联接关系的网络化的影响传播方式，这样一来老师的教学就被有力地放大了。菲德尔·卡斯特罗(Fidel Castro)在1960年当政之后将一个非常相近的方法应用于古巴。当时古巴农村的文盲率高达42%，但很快就降到了5%以下。如果要判断古巴政权是否成功，教育是比人均GDP更好的标准—因为美国从1960到2015年的持续禁运令对于古巴的经济发展显然是一个严重的阻碍。

### 3.2.4 交互浪潮

#### 消除社会壁垒

1949年以前的中国，农民和地主以及商人之间存在分化，这种现象与法国曾出现过的贵族和平民之间的阶层分化非常类似。在这两个案例中，消除阶层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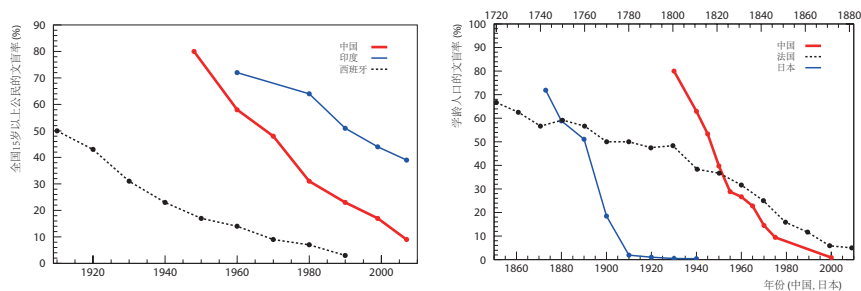


图 3.3: (左) 15岁以上文盲占总人口的比例。在中国共产党的官方定义中,“读写能力”为认识1500个汉字; (右) 学龄人口的文盲率。上面的水平标尺(1720-1880)是法国曲线所对应的年份。按照该度量标准, 如果我们考虑总人口(而不只是学龄人口), 文盲率的下降将会更快。

数据来源: 参考文献(Jan 1964, Peterson 1994, Tempest 1997), 以及网站:

<http://www.asianinfo.org/asianinfo/china/pro-education.htm>,

<http://www.nationmaster.com/country/ch-china/edu-education>

至<sup>5</sup>都提高了个体之间的互动。我们不妨来看下面这个简单的例子:

英语中只会用“你(you)”来指代对方, 但法语却有两种形式:“你(tu)”用于朋友,“您(vous)”用于不太熟悉的人(这一点与中文较为相近)。1789年大革命之后,“您(vous)”这种形式被废除了; 因此至少在此后若干年, 一位士兵就可以这样跟一位将军打招呼:“你好啊公民将军!”<sup>6</sup>语言的变化显示了消除人与人之间阶层分化的愿望。

消除分化的过程有两种形式(如图3.4所示): 第一种形式下节点的空间位置没有变化, 举例来说就好比农民拥有了更多的权利, 但仍然待在他们的村庄中; 第二种形式下两类节点之间的距离缩短了一——这种情况与农村人口迁徙(村民移居到城市)相一致。

衡量城乡差异的一个间接指标是婴儿死亡率(即刚出生至一周岁的婴儿未存活的比例), 它既可以反映医疗保健质量又可以反映生活条件水平。数据显示自建国近十年之后婴儿死亡率下降十分迅速(如图3.5所示), 这也说明政府缩小城乡差距的努力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成功的。

### 农村人口迁徙(城镇化)

在改革开放前后, 农民开始大规模进入城市, 可以说这也是缩小城乡差距的一种途径, 这场移民潮也创造出了许多大城市[1000万人口在目前的中国只能算是中等城市, 但在美国人口超过1000万的城市截止目前(2017年)都不超过10个]。同时伴随着包括汽车工业在内的各类工业飞速发展, 如此高的人口密度也导致了许多污染问题。未来十年能否解决这一问题, 让我们拭目以待。

<sup>5</sup>当然用何种方式来达成这一目标是须要非常审慎的, 历史上的许多做法或许都太过粗暴, 而且也未必会是最为有效的方式。

<sup>6</sup>法文:Comment vas-tu citoyen General? 英文: How are you doing citizen Genera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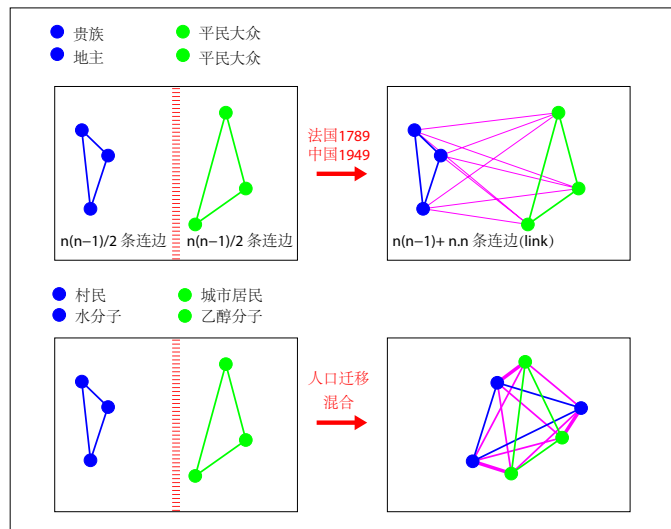


图 3.4: 通过消除壁垒来增加阶层互动。互动的增加有两种方式:  
 (上) 消除不同社会阶层群体间的壁垒。双方的个体分别用蓝色节点和绿色节点表示, 这一过程一如法国和中国在各自革命之前, 富人和普通人之间存在着刚性壁垒。  
 (下) 消除阶层壁垒并且同时重新放置蓝色节点和绿色节点的位置以使它们彼此更加靠近。举例来说这就好比是人口流动过程中农民从农村进入到城市; 在这种情况下, 不仅两类节点间的连接数量更多了, 而且连接强度也更高了。以物理现象做类比的话, 这一过程就像是水和乙醇(酒精)的混合; 在混合物中水分子和乙醇分子重新建立了新的联接, 这一过程还导致大量的热能释放, 继而可将混合物的温度提高4-5度。不过应该特别注意的是, 这样的类比只是非常粗浅的便于大致说明结构变化之用, 真正的社会过程远比物理过程要复杂的多, 许多实际的问题有很多无法用这样简单的物理过程解释的地方。

### 3.2.5 经济飞速发展

中国的实际GDP(real GDP)<sup>7</sup>在1950-2016的67年间增长了100倍(见图3.6), 年平均增长率 $r = e^{\ln(100/67)} - 1 = 7.3\%$ 。图3.6还显示了改革开放前后实际GDP增长的显著连续性。

如果图3.6使用基于官方汇率所得的美元为单位, 那么苏联在1952-1990年间的GDP就不是增长了4倍而是 $4 \times 6.6 = 26$ 倍<sup>8</sup>; 但这显然不是真实情况, 我们无法找到任何支持这一结论的美元对卢布汇率曲线。最近的一项研究(Trefilov

<sup>7</sup>根据历史通货膨胀率校正计算后所得的“国内生产总值(GDP, Gross Domestic Product) 被称作实际GDP(real GDP), 其简易的计算方法为:  $real\ GDP_x = \frac{GDP_x}{CPI_x / CPI_0}$ , 其中 $CPI_x$ (Consumer Price Index)是 $x$ 年时的消费价格指数”,  $CPI_0$ 则是作为比较基准的年份的消费价格指数; 例如图3.6中的基准 $CPI_0$ 值就是 $CPI_{1952}$ (也就是1952年时CPI的数值)。

<sup>8</sup>官方数据显示1950-1990年间苏联卢布的官方汇率增长了6.6倍(1950年1美元可兑换4卢布, 而1988年1美元只能兑换0.58卢布)。但由于卢布并非可自由兑换的货币, 所以无论是官方的还是非官方的任何汇率, 都是人为制造进而没有意义的汇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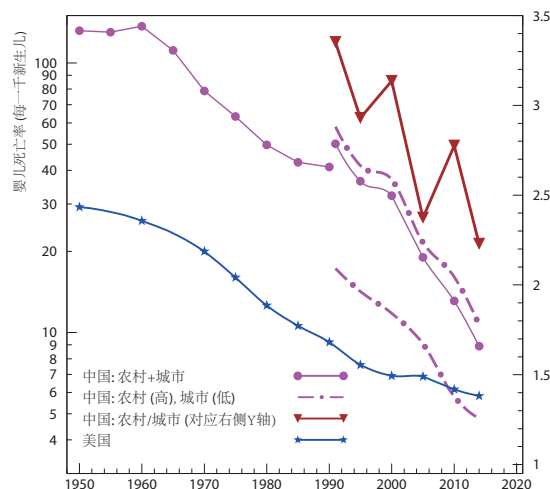


图 3.5: 中国和美国的婴儿死亡率。图中上下两条点虚线分别是中国农村和城市的数据; 考虑到中国的农村人口远远多于城市人口, 所以总人口曲线(图中的点实线)会非常接近于农村曲线就并不奇怪。农村与城市之间的重大差距过去存在现今依然: 从1950到1990年间我们没能获得农村与城市各自的单独数据, 但1990年以后的曲线清晰地表明农村地区的曲线与全国数据的曲线非常一致, 所以对于1990年之前的部分我们可以用全国数据近似代表当时的农村数据。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到从1950到1965年间农村婴儿死亡率几乎没有下降。数据来源: 中国1950-1990: Knoema网站(一个专业的数据库搜索引擎); 中国1990-2014: 《中国统计年鉴》; 美国1950-2014: 《National Vital Statistics Reports 65,4,30 June 2016(国家人口统计报告)》

2015)显示1988年的官方汇率是1美元兑换0.58卢布, 而黑市汇率为1美元兑换33卢布(是官方汇率的57倍)。所以如果以卢布为单位, 那么苏联GDP的年平均增长率就只有3.4%(如图3.6所示)。

### 3.2.6 有效的武装力量

对于任何一场革命或重大的社会运动, 武装力量往往都扮演着重要角色。如果革命者(反叛者)无法组织起有效的军事力量使之足够强大、并足够相信革命的正义性, 革命往往都会以失败告终。历史上有很多或成功或失败的例子:

- 太平天国运动从1850年一直持续到了1864年。这场兴起于中国南方的运动试图推翻满族人的统治、将中国人民转变成太平天国版的基督教徒、在全中国实现全面转型和变革。最终在西方列强的帮助下, 清政府镇压了这场运动。太平天国运动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农民起义, 整个运动中的死亡人数数据估计达到了3000万(占当时中国人口的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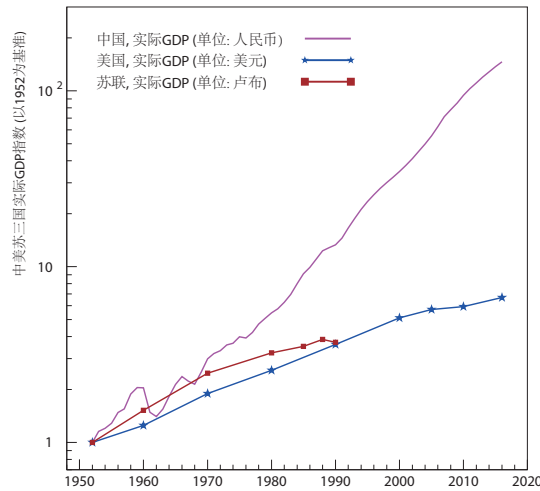


图 3.6: 中国、美国和苏联的实际GDP(real GDP)。为方便比较实际GDP的增长率, 三条曲线均以1952年为起点, 也就是将1952年实际GDP总值当作起始值(设其为1), 用后面年份的实际GDP数据除以1952年的数据就可以得到各年的增长率指数。苏联的GDP自1991年之后急剧下降, 尽管他们有美国顾问的建议作为参考支持(有种理论认为或许正是因为听从了那些建议才使苏联落得如此境地)。

资料来源: 中国: 互联网网站“中国力Chinability”; 美国: 圣路易斯联邦储备银行(Federal Reserve Bank of St. Louis); USSR: 参考文献(Firth et al. 1998))

- 西方列强和日本在俄国红军1917年革命之后派出大批远征军到俄国支援白军<sup>9</sup>, 即使是新成立的中华民国也派出了2300人的军队到俄国; 其他国家的派出规模更大: 日本派出了7万人, 捷克斯洛伐克派出5万人, 希腊派出2.3万人, 美国派出1.3万人<sup>10</sup>。盟军共计约有14万人参战(详见英文维基百科文章《Allied intervention in the Russian Civil War(盟军介入俄国内战)》)。所以如果不是俄国红军的有效动员与组织, 俄国革命就会像太平天国运动一样以同样的方式被粉碎。
- 抗日战争结束以后, 美国派出约10万人的军队到中国来押送日军士兵回日本。但实际上许多日本部队在投降之后转而帮助国民党来反对共产党, 他们直到数月之后才被送回日本。美军在1945年以后仍然延续着二战期间的做法—继续训练、武装并支持国民党军队<sup>11</sup>。对于很多人来说, 1947年以后国民党军队的迅速溃败来得有点突然, 然而如果考虑红

<sup>9</sup>白军是指1918年至1920年年间在俄国内战中对抗苏俄工农红军的军队, 主要由支持沙皇的保皇党和自由主义者等反布尔什维克势力组成。他们是支持过去政府的, 因此俄国红军在最初是处于反叛军的对位。

<sup>10</sup>美国派出的军队由两部分组成: “美国北俄远征军”(American North Russia Expeditionary Force, 共5000人)被派到俄国西北部的阿尔汉格尔斯克港(Archangelsk); “美国远征军西伯利亚”(American Expeditionary Force Siberia, 共8000人)则是从菲律宾运到海参崴。

<sup>11</sup>更多细节详见参考文献(Roehner 2016c)。

军和国民党军队中各自士兵的处境，这个结局也就不难理解了。两方当时的对比确实相当鲜明：国民党军队普遍是被武力强征来的，而拨给军队的经费又常常被腐败官员所挪用；与此相反，红军军官与士兵同吃同住。而这样的结果就是在战斗打响前或战斗期间，国民党士兵纷纷倒戈。

下面方框中的内容是1949年1月31日在解放军占领天津后美军人员提供的证词(testimony)，根据其内容也可以部分地证明人民解放军在1940年已然是一支新型军队这一说法：

人民解放军官兵的行为给我们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他们除了热水或茶水外拒绝任何礼物；他们经常主动把自己少得可怜的口粮给自己驻家的户主，尤其是孩子们。他们在市区巡逻，保护公民财产。在商业街上，他们为那些窗户被打碎的商店设置了警卫。虽然大部分“前线”部队已经被不那么“精英”的部队替换了下来，但眼前这些军人的行为同样令人钦佩。城市解放大约一周后就可以向解放区其他城市发送信件了，但还不能向国民党占领区的城市寄信。  
资料来源：美国国务院韩国内部事务记录，微型胶卷，第8卷，收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

读者可能会疑惑，为什么关于天津解放的记录会出现在关于韩国(Korea)的资料里，这是因为天津“经济合作管理局”(ECA，成立于1948年的美国机构，旨在管理马歇尔计划)的三位成员在1949年3月22日抵达首尔；这一日期表明当他们发布这份记录的时候，这三人已经不在中国了，也就是说完全可以排除他们说这些好话是为了获得人民解放军领导人的帮助。当读者意识到向整个欧洲传播公民权利的法国革命军的行为与其信条其实并不总是一致时，这份证词便尤其引人注目。

### 3.3 国家激活案例的比较

本节将讨论其他国家激活过程中的某些方面，我们并不试图去进行系统性的对比，主要目标是突出相似性。

#### 3.3.1 广泛的信仰认同和增长的群众基础

为了说明法国大革命所传播的信仰，我们摘录了1789年8月全国制宪会议通过的《人权与公民权利宣言》中的一些条款：

- 在权利方面，人们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第一条)
- 整个主权的本原，主要是寄托于国民。任何团体、任何个人都不得行使主权所未明白授予的权力。(第三条)
- 在法律面前，所有的公民都是平等的，故他们都能平等地按其能力担任一切官职、公共职位和职务，除德行和才能上的差别外不得有其他差别。(第六条)

这些声明标志着自那时之后普遍局势上的急剧转变：



图 3.7: 《人权与公民权利宣言》(简称《人权宣言》)。在这幅由法国画家(Jean-Jacques-Francois Le Barbier)绘制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三样非常有趣的东西: (1)顶部的辐射三角形里面有一只驱散乌云的眼睛, 它象征理智的统治。这一共济会符号还出现在1美元面额的钞票上“我们相信上帝”(“In God we trust”)的格言旁。(2)左手边的女士象征着挣脱锁链的法国人民。(3)中间的红帽子(“自由帽”)是一个象征自由的古老符号。(资料来源: 维基百科文章《人权与公民权利宣言》)

- 过去, 贵族的儿子可以继承他的社会地位。通过这个地位他可以获得一些职务, 尤其是在陆军或海军, 而普通民众却没有这个资格。
- 过去, 所有主权的本原都不属于国家, 而是属于手握王权的人。

当时欧洲唯一的共和国是瑞士, 因此法国在采纳这一宣言并试图将这一理念传播到邻国后, 遭到了欧洲所有君主制王国的敌视和抵制。

### 3.3.2 自由帽的反复出现

图3.7中自由帽的反复出现说明历史事件中的元素往往有其自身的生命周期(并且往往要比人类的寿命长很多); 自从古代的自由奴隶佩戴之后, 自由帽就在法国历史的若干个时期中曾多次出现:

- 巴黎民众的一支武装力量在1358年2月23日攻入了西岱宫(Palais de la Cité)—14世纪之前法国国王一直居住在那里。民众领袖马塞尔(Etienne Marcel)要求查理五世佩戴一顶红蓝两色的自由帽(详见法语版维基百科文章《查理五世》)。
- 在1675年的反税收起义中自由帽再次出现, 当时被称作“起义的红帽子”。

- 1792年1月，1358年的场景再次上演，巴黎民众攻入国王的宫殿，要求路易十六戴上自由帽。
- 从图3.7的底部可以看到，在2017年4月总统大选中，自由帽被用来表示对候选人让-吕克·梅朗雄(Jean-Luc Mélançon)的政治支持。

### 3.4 小结

与其再次罗列总结前面几节的内容，我们想以一个更有趣的问题来为本章作结。最近科幻作家刘慈欣凭借《三体》三部曲在国内声名鹊起，在2015年获得雨果奖之后受到了更多的关注。《三体》最早以连载形式发表于2006年，并于2014年翻译为英文在国外出版，2017年还被翻译为了法文。我们将透过《三体》来讨论一下中国文学是否处于(类似于国家激活的)激活状态。

#### 3.4.1 中国文学是否处于激活状态？

刘慈欣并不是第一个获得西方文学大奖的华人，高行健在2000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高行健生于中国、学于中国，他于1986年在他46岁时来到了法国并于1998年成为了法国公民。虽然他的部分作品是用法文写成，但大部分都是中文写就。莫言在2012年成为了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第一位中国公民。由于科幻作品在中国非常流行，刘慈欣相较于高行健和莫言可能在年轻人当中拥有更多的读者。从某种意义上说刘慈欣的成功可能能让我们窥见到中国在文化和艺术领域的激活过程的开端。

但是科幻市场仍然大部分被美国作家所控制，事实上刘慈欣在2015年与其他5位美国作家共同获奖，在过去所有雨果奖得主中有超过90%的作家都来自美国<sup>12</sup>。换言之，中国科幻文学想要达到与美国相齐平的程度可能要比在GDP方面取得平等须要更长的时间。

#### 3.4.2 历史学家倾向于研究单体问题

《三体》让更多的读者了解了三体问题，这类问题是指三个质量、初始位置和初始速度都是任意的可视为质点的天体(例如太阳、地球、月球)，在相互之间万有引力的作用下的运动规律问题。三体问题不能精确求解，而两体问题则可以通过牛顿力学轻松解决。虽然对于天文学来说研究单体问题没有什么意义，但对于历史学家来说在研究某一个国家时却容易将其当作单体问题来对待、而忽略这个国家与其他国家之间的众多相互作用；然而一个国家的成功或失败不只取决于其国内政策，也受到其他国家的强烈影响。

如果只从单体问题的视角来看待中国科幻文学，那么似乎未来发展将异常顺利；但美国科幻作家并不会轻易放弃他们在中国科幻市场的巨大份额。除去代表他们利益的世界科幻小说学会(World Science Fiction Society)和世界科幻年会(World Science Fiction Convention, 雨果奖就是在这个年会上颁发)，他们还在极力将自己的译作推销给中国大众。近年来中国的科幻世界出版社就是美国科幻小说家进入中国市场的入口；自从其1979年成立以来，共有157部外国小说(几乎都是美国作家的作品)被翻译为中文。有研究表明到2000年初时，美国

<sup>12</sup>雨果奖的设立就是为了致敬美国科幻作家雨果·卡恩兹巴克(Hugo Gernsback, 1884-1967)。

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时的作品仍是中国科幻市场上的主流。未来十年科幻小说领域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将会非常让人期待。

刘慈欣在不久之前还是山西一家水电站的软件工程师，他在43岁时开始在《科幻世界》杂志上以连载形式发表自己的小说，换言之他当初作为作家完全是一个业余爱好。我们也希望本书能够激起大家对于比较历史学的兴趣，并且将发展比较历史学或者用比较历史学视角研究问题当作一种自己的业余爱好，这样既能让我们对于各类事件有更客观的认识，也能将比较历史的方法更加逐步完善。